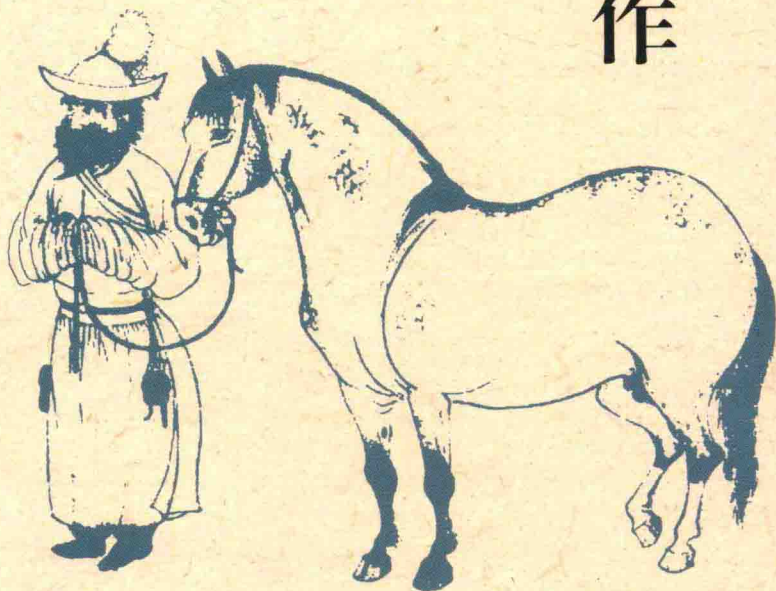


温斌◎著

民族文化交融与 元代少数民族作家创作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民族文化交融是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文化生成、发展的原动力，对于古代少数民族文学，特别是元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盛极一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民族文化交融也成为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主要原因。因此，不论是还原中国古代文化、文学的真实性，还是重新梳理古代文化的多彩进程，都有必要对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及其对古代文学，特别是元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做一个客观的描述和总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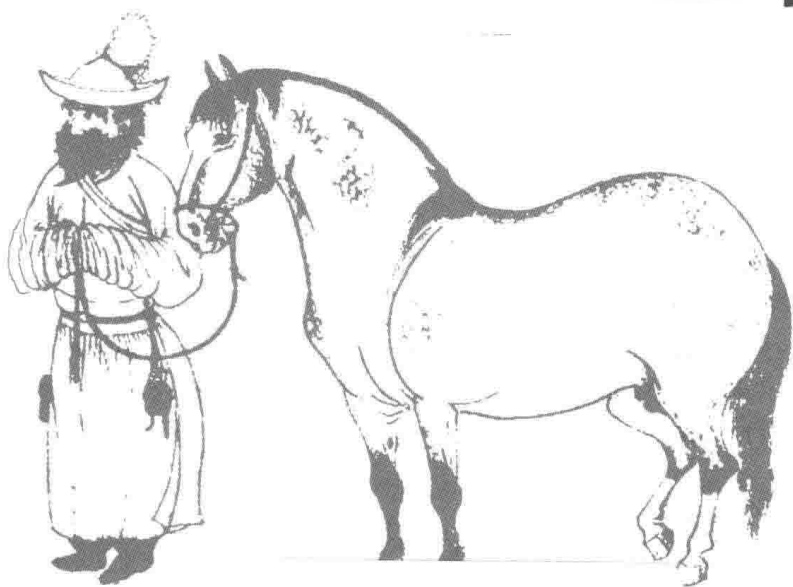
吉林大学出版社

温
斌◎著

民族文化交融与 元代少数民族作家创作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民族文化交融与元代少数民族作家创作”（11YJA751075）的研究成果



吉林
大学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文化交融与元代少数民族作家创作 / 温斌著.
—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677-2708-3

I. ①民… II. ①温… III. ①少数民族文学—文学研
究—中国—元代 IV. ①I207.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91778号

书 名: 民族文化交融与元代少数民族作家创作
作 者: 温斌 著

责任编辑: 仲怀民 责任校对: 仲怀民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9.25 字数: 260千字
ISBN 978-7-5677-2708-3

封面设计: 徐占博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长春市明德路501号 邮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89580026/28/29
网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谨以此书献给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时代

前言

谈及中国古代文化或中国古代文学，一般多从汉民族文化、文学说起，给人一种文化一元、文学独有的印象；有的文学史著作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也往往浮光掠影、轻描淡写。因此，不论是还原中国古代文化、文学的真实性，还是重新梳理古代文化的多彩进程，都有必要对民族文化交流的历史及古代文学特别是元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做一个客观的描述和总结。

一、中国文明的多元起源与民族文化交流

民族文化交流的前提是文化的多元性，而对中国古代文明源起的认识存在着“一元”和“多元”的争论。不论是大量的先秦史籍，还是不断出现的考古发掘，均有力的证明了在中国文明发轫时期，中国大地上已经有众多民族类人群生活、繁衍、发展；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气候等客观生存条件的不同，他们在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也有极大的差异。但不管是什么样的文明，都是该地区、该民族所创造的财富，都是对中华文明的有益贡献。一句话，中国文明源起于多元民族和文化并存的状态，而非传统的一元格局。这是探讨民族文化交流这一课题的起点和基础。

二、先秦——民族文化交流的根基

中国古代文化从来都是以朝代、民族、生产方式、地域等特征来称谓的，如汉唐文化、汉民族文化、女真民族文化、游牧文化、航海文化等，而主要

的是用民族来称谓文化，也就是说民族已经成为文化的符号和标志。随着历史的发展，强大、发达的农业文明使华夏民族在夏、商、周之际成为了客观上的中国的“中心”，成为了古代民族文化交融的“中心”。

从先秦史实来看，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融是文化交融的核心内涵，而战争、移民、通婚等方式无疑是最主要的交融方式。先秦作为古代民族文化交融的奠基时期，证明了不管是何种文化的如何交融，其最终的目的都为了推动社会和民族的发展。而正是由于先秦民族文化交融充满着的人类理性的光辉，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文化特征的形成才具有了坚实的基础。

三、汉代的民族文化交融

受先秦“天下”观念和“华夷”思想的影响，汉王朝从来也没有把游牧在北方的匈奴当做独立的统治王朝来看待，在汉、匈之间不断的“战”与“和”交织推进的过程中，双方的政治文化、宗教文化、生活习俗等得到了广泛、密切的交流。相对于历史悠久、制度严密的中原王朝来说，作为游牧文化代表的匈奴王朝从建立的起始就显示出鲜明的原始、松散、单一、宗法血缘关系独特等特征，导致了在汉王朝日渐强大的政治军事打击之下的最终解体。匈奴王朝兴盛与衰亡的历史恰好是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碰撞与交融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农业文明的强大、稳固、韧性与游牧文明的新鲜跃动、生机勃勃形成了极为有利的互补与促进。南匈奴的附汉标志着中国古代最早的游牧民族文化已经从各方面深深地融入华夏民族的宏大文化系统中，成为中国古代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交融的深厚基础。

四、魏晋南北朝的民族文化交融

至魏晋南北朝，中国历史的民族文化交融更为宏大、宽阔、深远，呈现出全方位、立体式的特点。各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祖先、中华民族身份、儒家天下正统观念的认同和实践等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是这一时期民族文化交融的最为辉煌的乐章；而“胡汉分治”作为历史的插曲，虽然从根本上不利于

民族之间的大力融合，但却是民族文化交融过程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惟有过程中的“分治”，才能有逐步的“融通为一”，才能最终形成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宏博深远。

由于民族文化的大力交融，中国古代文化的开放、融合特性已经初步形成。“经典”、“权威”逐步消失，惟一种民族、一方区域的文化垄断、独据的局面已不存在；相反，相互学习、多元并存、多元交融蔚然成风，从政治文化到经济文化、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等，都体现出包罗万象、开放融合、兼收并蓄的倾向；以汉民族传统文化为中心，多民族文化互相依存、相互吸纳、共同发展已成为时代的精神，构建以多元一体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特征的趋势已初步形成。

历史证明了不管如何交融，最终均以少数民族文化纳入汉民族文化系统、汉民族文化铭刻上鲜明的少数民族文化特征为结果。在民族文化交融的推动之下，此时期的文学艺术更加异彩纷呈，呈现出文学创作美学追求的多元化、创作群体的多元化、艺术形式的多元化等特征。

五、唐代的民族文化交融

唐代的民族文化交融是在前代多元民族文化交融的强劲、深厚基础上向前推进的，其中李唐皇族的崛起更是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果，从而对唐代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民族文化交融的洗礼。

相较于南北朝而言，唐朝文化的多元与一体的关系已经初步建立，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一体的基本特性已经初步显示出来。多元是指文化形态的多种多样、交融共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体是指政治统治的中央一元化、政体一元化，二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着中华民族整体的进步、发展。

唐代的民族文化交融催生了唐代文学艺术中弥漫涌动的“胡风”、“胡气”、“胡音”、“胡色”，使中国文学出现了别具一格的唐代气象；第一次浓墨重彩地展示了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异域文化，从而将中国古代文化、文学推向了一个新的更加融合、更加多质、更加异彩纷呈的高度。

六、元代民族文化交融的特性

总的来说,元代的民族文化交融对汉代所形成的的门阀制度文化和作为汉民族传统文化传承者的汉族士人根深蒂固的民族隔膜观念形成巨大的冲击,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交融史上的第二个高峰,而古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辉煌时代也已到来。

七、元代民族文化交融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影响

(一) 民族文化交融与元代少数民族戏曲创作

在民族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下,少数民族戏曲创作在题材开掘、主题创新、人物塑造、艺术革新等方面更富有民族文化交融深化、拓进的意义。少数民族戏曲探索和彰显民族文化精神,吸收和改造儒家文化传统,融会贯通多元文化内涵并与世俗文化合流,在元代剧坛上独树一帜,从而形成了元代少数民族戏曲创作的独特风采。

女真族剧作家石君宝极为强调民族文化特质的保留及时代化的演进,既延续传统文学题材的人物本性,又巧妙地熔铸游牧文化精神,既使人物具有传统汉文化的道德之美,加强对汉文化精髓的体认,又将游牧文化特有的自由、刚毅、独立、豪壮的人格之美寄寓其中,从而使传统“秋胡戏妻”更体现时代民族文化交融之美,人物更具有多元文化交融的魅力。

另一位女真族剧作家的《虎头牌》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对山寿马公而忘私优秀品格的赞美上,更主要的是对民族独特的风俗风情的深情歌咏和记录方面。

元末明初蒙古族剧作家杨景贤以独具民族文化特征的艺术视野和包容、坦荡的创作心怀,在《西游记》中塑造了众多鲜活灵动又富有个性解放色彩的女性形象,凝聚了不断进步的时代精神和鲜活跃动的民族文化,进一步丰富了古代文学创作的女性视野;同时也开创性地展示了猪八戒卓有文化内涵的艺术形象,其佛道魔一体的世俗宗教文化特征体现了世俗化审美与草原文

化的有机融合，为吴承恩小说《西游记》猪八戒形象的塑造，奠定了坚实的艺术基础。

而值得注意的是，元代发生的第二次蒙越战争中李元吉被俘事件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中越戏曲交流史上的一件较有意义的事情，为越南戏曲的发展施以影响，从中亦可以窥出两国文化之间“车书本一家”的文化交融历史。

（二）民族文化交流与元代少数民族散曲创作

元散曲产生、发展于多元文化交融、汇聚的时代背景之下。涌现出诸多以民族文化交流的视角来进行艺术表达的少数民族散曲家，他们从叹世归隐、咏史怀古、爱情婚姻和歌咏自然山水之美等角度标新出奇，创作了诸多具有鲜明民族文化交流特色的散曲作品，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园地。

西域色目文人不忽木将儒家传统政治价值追求和人生修为践行在其人生中完美体现，堪为西域儒行第一；他的散曲套曲【仙侣·点绛唇】《辞朝》真实再现了他异常冲撞、丰富的精神世界，在元代西域文人当中独树一帜，成为一种具有鲜明民族文化交流时代特征的文化现象。

蒙古族文人阿鲁威的散曲是对屈原《九歌》再创造，去除了屈原《九歌》中的阴柔细腻的部分，保留并注入了刚强豪迈的内容，体现了汉文化与本民族文化对作者的双重影响，从中既可感受到阿鲁威积极入仕的精神，也能看到以屈原为代表的汉民族文化已在少数民族文人中深深扎根。另一位蒙古族作家童童及其文学作品，既显现出许多蒙古民族的文化元素，也包容了深厚的汉民族文化内涵，是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晶。

（三）民族文化融合与元代少数民族诗歌创作

从中国诗歌史的整体发展来看，元诗出现了一个其它朝代无法比拟的特有景观，就是诗歌创作队伍的民族多元化，出现了诸多如耶律楚材那样文质俱佳、才情洋溢的少数民族诗人，他们的作品极少寥落、凄清、肃杀之气，不论是雄奇壮美的边塞诗作，还是明丽清朗的山水之诗，抑或是对现实生活的深刻反映，均有一种豪壮磊落的文化品格。他们努力将粗犷豪放的游牧文

化精神与深邃典雅的汉民族传统文化融于一体，将个性才情与多民族文化素养汇于一炉，锻造出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精彩诗章。

元代少数民族的边塞诗聚焦于边塞的奇异风光和风土人情的摹画上面，力求显示出草原的无限活力和生机盎然，展现一种乐观向上的力量，一种踏平一切的勇气、豪气，一种将小儿女之情置之度外的阳刚之气。作为元代初年的杰出的军事统帅，伯颜在戎马倥偬之余也有多首极富时代政治文化和民族风格的诗歌，堪为元代少数民族诗人的先驱。而耶律楚材、马祖常、萨都刺等堪为其中的代表。

规模唐诗是元代少数民族诗人山水诗创作的整体风貌，其中耶律楚材和其西域风光诗，长篇短制都写得气势开阔，清壮健朗，是元代前期诗坛上的一枝奇葩。题画山水诗的构制是元少数民族诗人创作中应和诗坛风尚的新的亮点。

作为族出蒙古的诗人聂镛，来到汉文化高度发达的江浙地区，主动学习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汉文化，达到了“通经术，善歌诗”的高超水平。他善于使用各种诗体，举凡律诗、古体、绝句，都能把握其特点，发挥其功能。律诗工稳紧凑，古体跌宕奔放，绝句质朴蕴藉，对汉语的使用如同使用母语一样挥洒自如；对汉语诗歌艺术特质的把握得其三昧，体现出精湛的艺术技巧和较高的创作成就。

此时又有高丽文臣李齐贤等出使中国，从其《奉使录》的诗作中可以看出异域文人对元代中国的印象，一方面在儒家政治伦理层面上流露了对蒙古统治者的不满，忧叹已经以夷变夏的中国，另一方又欣喜于中国仍然保存的、壮美的风物景色以及所蕴含的丰富人文内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代高丽文豪对于文化上同源同质的中国所饱含的崇敬、关切、热爱的深情。

（四）元代散文发展与少数民族文人创作概观

从元代散文发展的阶段来看，前期只有一些少数民族贵族从事散文的创作，而耶律楚材无疑是主要代表。《全元文》收录了耶律楚材的散文 85 篇，

其中内容与佛教相关的有72篇，可见耶律楚材的创作深受佛教信仰影响。他对禅学所倾注的热情，远非同时代的大多数作家所能及。除此之外，他还创作了颂赞、碑铭、杂记等，宣传禅学思想、弘扬佛学。

此外有影响的人物当属耶律楚材之子耶律铸，与耶律楚材不同，他的主要成就不是散文而是骈文。《全元文》收录耶律铸文章29篇，其中27篇是赋，并且这些文章几乎都是描写亭台楼阁、风景宴乐，为我们展现出元代初期社会承平的景象。他所作的赋，可以说是句句有典故，有着深厚的汉文化功底。

不忽木和廉希宪一样都是来自西域，但是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全元文》虽然只收录了不忽木三篇文章，但是从这仅有的作品中不难看出其在思想上和创作上的倾向，即对汉文化和儒家思想的极力推崇，

中期散文从内容上看，以记述社会百态、日常生活为主；从形式上来看以游记、碑文为主，这两方面特点的产生得益于社会的稳定繁荣和对儒学的日渐重视。例如楔哲笃的《重修县学记》、孛术鲁朮的《襄城县学记》、《高平县庙学记》都反映了当时儒学发展的普及与兴盛。

后期少数民族文人的散文创作与整个元代散文的发展轨迹相吻合，较少有上乘之作。说明民族文化交融的大背景是推进元代少数民族散文创作的主要因素。

元代散文最值得赞美的就是元代游记文的发展，特别是历史上罕有的边疆游记。如元代对云南地区的开发与建设，产生了如郭松年的《大理行记》等边疆游记文，这些作品如实的反映社会生活、自然风貌，具有极强的历史资料价值。

（五）《蒙古秘史》的文化观照

《蒙古秘史》作为蒙古民族最早的文学经典，堪为蒙古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精神的艺术反映。

对于复仇精神的歌咏，《蒙古秘史》记载了众多纷繁交错的复仇事件，

其中血亲复仇与荣誉复仇等复仇母题在作品中频繁而突出，蕴含着坚韧顽强、诚实守信、团结协作等蒙古族文化精神。

结拜这一现象在早期草原游牧文化中比较具有普遍性，其本质是对于血缘关系的一种模仿。《蒙古秘史》如实记述了草原上部族首领之间的结拜现象；这种结拜往往以部族战争为背景，以双方的身份地位为基础，以某种仪式作为标志，体现出蒙古人团结协作、守信重义、豁达包容等民族文化精神。

《蒙古秘史》是一部典型的生态文学作品，它突出地反映着蒙古民族对待自然世界的生态思想，同时也蕴涵着淳朴而深厚的生态审美特色，可以概括为：原始朴素的生态天然美、和谐稳定的生态整体美、客观平等的生态交融美。

总之，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民族文化交融是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文化生成、发展的原动力，对于古代少数民族文学、特别是元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盛极一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民族文化交融也成为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主要原因。

目 录

上编：民族文化交流的历史追寻

第一章 中国文明源起于多元、并存的文化形态	1
第二章 由先秦看民族文化交流的主要内涵	5
第一节 “文化中心”的自然形成与民族文化交流	5
第二节 从先秦看民族文化交流的主要内涵	13
第三章 汉代的民族文化交流	19
第一节 汉朝对以匈奴为代表的游牧文化的认识	19
第二节 汉、匈奴民族文化交流的内容	27
第三节 汉、匈奴民族文化交流的意义	31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文化交流	39
第一节 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运用	42
第二节 对于“胡汉分治”的认识	58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民族文化交流的意义	61
第四节 民族文化交流的文学意义	71
第五章 唐代的民族文化交流	78
第一节 高度自觉的民族文化交流	78

第二节 民族文化交融的社会和文学意义	89
第三节 民族文化交融历史的特点	97

下编：元代民族文化交融与少数民族创作

第一章 元代民族文化交融的特性	102
第一节 元代民族文化交融的深广性	102
第二节 “两都制”对于民族文化交融的意义	104
第三节 民族文化交融的深度拓展	111
第四节 元代民族文化交融的新现象	122
第五节 民族文化交融对元代文学的影响	128
第二章 民族文化交融与元代少数民族戏曲创作	131
第一节 女真族作家石君宝与《秋胡戏妻》	131
第二节 女真族剧作家李直夫与《虎头牌》	145
第三节 蒙古族剧作家杨景贤与《西游记》之女性形象	153
第四节 杨景贤与《西游记》之猪八戒形象	159
第五节 元代宫廷乐师李元吉对越南唢呐剧发展的影响	164
第六节 民族文化交融与元代少数民族戏曲创作断思	170
第三章 民族文化交融与元代少数民族散曲创作	172
第一节 元代少数民族散曲概述	172
第二节 志心两离不忽木，西域儒行第一人	182
第三节 蒙古族散曲家阿鲁威创作的独特之处	198
第四节 蒙古族文人童童的散曲创作	205
第四章 民族文化融合与元代少数民族诗歌创作	212
第一节 元代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素描	212
第二节 元代少数民族诗人山水诗之创获	223

第三节 耶律楚材山水诗的审美风貌	227
第四节 聂镛——玉山雅集中的蒙古人	231
第五节 一个域外高丽文人心中的元代中国观	237
第五章 元代散文发展与少数民族文人创作概观	245
第一节 元代散文分期与少数民族文人创作	245
第二节 元代扩张对古代游记文创作的影响	255
第六章 《蒙古秘史》的文化观照	262
第一节 《蒙古秘史》复仇母题探析	262
第二节 《蒙古秘史》之结拜现象解析	268
第三节 《蒙古秘史》的生态审美意识	274
参考文献	284
后 记	290

上编：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追寻

第一章 中国文明源起于多元、并存的文化形态

中国文明、文化究竟从何时起步？究竟在哪里发源？现今学术界都难有公认的确论，寻其原因恐怕最主要的是“文明”、“文化”的标志究竟最初应该体现在哪些方面、哪些事物和哪些层面上。这些问题不解决，起源的问题就无法回答。

“文明”是人类成为“人类群”而非“动物群”的标志，其最突出尺度主要是它的内涵。根据《辞海》对“文明”的释义解答：犹言文化，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指人类社会进步状态，与“野蛮”相对；指时新的事物，如早期话剧称文明戏，新式结婚称文明结婚等；指光明、有文采等。^①也就是说，当人类有意识地开始创造物质财富或精神财富时，或体现出与“动物”生存本能显现出明显的差异并以此形成一定具有持久性特征的倾向时，人类的“文明”特质就表现出来了。

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探讨，历来就是一个备受瞩目、不断革新的话题。大体上有中国古代传统史学和近现代、当代人的认识两类观点，主要集中在

^①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27页。

“一元中心说”与“多元并存说”的认识上。前者以古代“正史”的开端《史记》为代表，认为中国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这里的“中”包含有地理区域、文化内涵、民族身份等内涵，有所谓“天下之中”的意义。它把以洛邑为中心的地域作为“天下之中”来认识和宣扬，对此，古代文献多有证据。

《史记·周本纪》：“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人贡道里均。”《汉书·地理志》：“昔周公营雒邑，以为在于土中，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师。”《说苑·至公》：“南宫边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龟曰：子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无中土乎？使予有罪，则四方伐之，无难得也。”周人之所以强调“天下之中”，目的就在于突出政治、文化的权威和号召作用。如此，凡是居于边缘、交叉地域的民族和政权就要受“居天下之中”地区在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安抚和影响。《史记·五帝本纪》记载：“於是舜归而言於帝，请流共工於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於三危，以变西戎；殛鲧於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这是说华夏民族的一部分有罪之人被流放于边疆四方，才有了各方不同的民族。分析司马迁的民族同源论史观，在他看来，中华各族即有同一个祖先，又极早就散落于各方，但均受“华夏”这一中心地区或文化的决定性影响。由此看来，司马迁的观点本身也存在自我矛盾之处。他一方面强调了各族各方同宗同祖的特质，又突出了原华夏民族的不法部分的谪贬各方，意在说明华夏、戎狄本身就是一家；另一方面，他又非常客观地谈到北狄、南蛮、西戎、东夷等各方民族在时、空上的久远存在。也就是说，各方民族早就在中华大地上繁衍、发展，并不比华夏民族迟晚，只不过在文化方面有差别而已。这样，受“正史”的影响，直到现代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华文明源起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而其他地区的文明是受其濡染传播所致。这就是所谓“一元中心说”的基本内涵。究其实质，这是由儒家“华夷之辨”导致，受“史学”传统而逐